

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以鸦片战争时期来华美国传教士为例

段 琦

内容提要：政教分离是美国的立国原则，但只是指宗教机构与政府机构的分离，决不是指宗教与社会和政治的分离。本文以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传教士就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签订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论述，以期阐释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关键词：政教关系 鸦片战争 美国传教士 清教徒

作者简介：段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一、美国的政教分离与清教徒精神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确立一种国教和禁止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美国立国的基础。为保证一切宗教都享有同等权利，就必须实施政教分离，不设国教。造成美国宗教这种特点主要是因为美国深受加尔文宗教清教徒传统影响。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不仅属清教徒嫡系的公理宗如此，而且加尔文宗的其它派别如长老宗、归正宗如此，就连原属英国国教会系统的圣公宗（在美国称主教制教会）都免不了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这不仅反映在美国式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上，也表现在各种宗教在美国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上。

美国是最早通过立法形式实施政教分离的国家。备受国教会迫害的清教徒从英国来到北美这块宗教自由的“迦南地”后，为确保信仰自由，他们对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会（圣公会）把政权与教权相结合、神职人员同时在国家政权中任要职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让一个牧师行使任何一种政治权力都是向罗马天主教会迈出了危险的一步”。^① 牧师职能是在教会内宣讲圣经、祈祷和劝导信徒，而不是充任政府要员，这些思想本身就隐含着教会和国家机构分离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清教徒思想影响下，美国在立国时便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正式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但这一原则决不是对宗教的否定，恰恰相反，是要保证各种宗教都享有自由。美国的立国者们在制定这一原则时，就认为各种宗教都同样的好，通过它们与社会的结合，就能达到“用道德来武装公众”的目的。^② 杰斐逊声言：各种派别“无限地发展，宗教很好地得到支持，的确形形色色，但一切都非常好；所有这些足以维持和平和秩序”。^③ 也就是说，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让宗教脱离社会，而是让各种宗教都能在社会中平等地、更充分地发挥各自维持社会和平和秩序的作用。无论国父们还是清教徒们都相信，“只有宗教兴旺发达，美国这一共和国才会兴旺发达。”^④

当我们了解了美国的这种清教徒精神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实施政教分离，但“宗教组

① [美]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杨国标、张儒林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0页。

② [美]R.G.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段琦、晓炜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③ 同上，第26页。

④ 同上，第26页。

织具有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动员的潜力”，^①宗教机构或宗教界人士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仍然产生影响。鸦片战争前后的美国传教士对美国政府制定在华的政策，特别是与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美国懂中文的人极其稀少，美国政府要同清政府打交道必须求助于他们，而传教士们也非常乐于为国效劳，积极主动地出谋划策，参与条约的签订，起到了美国社会中任何力量所起不到的作用。本文以他们为例，看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政治。

二、注重宗教道德价值议题，通过出版物影响美国公众和政府

有学者提到美国宗教界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与非宗教人士的不同点在于“要求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去追求道德或宗教价值……他们关注从经济公平到维护传统价值观，从国内政策到对外关系等广泛议题”。^②由于道德涉及到所谓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而公共道德本身的含义极其广泛，可以将一切社会正义、经济正义、世界和平列入其中，也可以将个人道德扩大化，因此宗教团体的议题十分广泛。当今通讯网络便利，通过它们使宗教界对各类问题的看法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对美国民众和政府产生影响。

鸦片战争时期来华传教士所关心的议题有——中国的社会、鸦片贸易、在华自由传教等等，都与道德和宗教价值有关。由于当时交通极其不便，来华传教士返美的机会较少，对美国大众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通过他们的书信，特别是所办的英文报刊。美国第一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0年抵达广州后，就开始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起筹办一份英文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为了扩大此刊在英美公众中的影响，他要求美国宣教会——美部会增派人员来华。翌年，美部会派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抵华，帮助出版此刊。与此同时，为了推进在华的传教事业，经裨治文的要求，美部会又派伯驾医生（Peter Parker）于1834年来广州开设医院，进行医疗传教。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英文月刊并非纯传教杂志。1832年创刊时，裨治文和马礼逊就确定它是向所有西方人准确无误地介绍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刊物，因为他们深感“西方人对中华文明所知甚少”，^③在这很少的内容中还有许多是错误的信息。此刊撰稿者虽绝大多数是传教士，但也不乏有知名的英美商人，在华的外交官员和海军军官等。该刊物“成为两国关于中国的最有价值、最可靠的信息来源”。^④正因如此，它对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民众的影响较大。该杂志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反对鸦片贸易，裨治文亲自撰写了多篇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所有来华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均与裨治文一样持反对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鸦片贸易与宗教伦理道德相背，必须反对。二是从在华的传教事业考虑，必须禁止鸦片贸易。

美国传教士对林则徐禁烟均持支持态度。裨治文对林则徐处理鸦片问题上的刚正不阿的态度也

① 黄飞君：《美国国会政治的宗教向度——兼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2期，第93页。

② 同上，第90页。

③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④ 同上，第109页。

赞赏不已。^①当他得知,林则徐致信英国女王,要求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贩烟却遭到英国外交部无礼的拒绝之后,便于1839年5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此信的全文,希望通过它能让英女王读到,以影响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决策。英女王是否看到此信不得而知,但裨治文用这种方式至少使部分英美人看到了信的内容,让他们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禁烟。

正是在传教士文章的影响下,在鸦片战争前夕,许多美国民众对中国持同情态度。正如雷孜智所言,“在鸦片战争前夕,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都是由于受到了裨治文和其他在广州的传教士所发表的文章的严重影响。泰勒·丹尼特曾这样评价:‘那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十年的传教士的报道,在美国民众当中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对大清帝国的同情。其中,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的罪恶的描述是影响公众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②美国公众的态度也对美国政府产生极大影响。他们中的多数也认识到鸦片贸易的固有罪恶,少数与鸦片商有着密切联系、为鸦片贸易辩护的高层官员遭到孤立,正是在公众压力下,美国政府对鸦片贸易采取与英政府完全不同的立场,最突出的表现在其后由顾盛(Caleb Cushing)为首的美国公使团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中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反对从事这类贸易。

鸦片战争时期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传教士得以在华自由传教。对这点传教士们均持肯定的态度,裨治文通过《中国丛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其中观点之一就是:‘中国出于骄傲和恐惧而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无法接近的’”。^③由此他非常希望早日打开中国大门。伯驾十分赞同裨治文的观点。1841年他返回美国时在美国各组织作讲演时,“描绘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强调了打开中国国门,让它接受基督教洗礼的必要”。伯驾认为中国妄自尊大,将那些不向天朝进贡的国家均视为不尽天职,因为他们将当朝的统治者均视为“受命于天,统辖天下”的。伯驾还让他的美国听众们相信,“是征服者满族窃取了王权,而中国的广大百姓处于他们的政治压迫之下”。^④传教士的这些言论对美国公众和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的大门必须打开,要让基督教来改造中国这个异教国家,这是美国传教士所向往的。问题是如何打开,是否应该像英国那样通过武力达到此目的。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议题。从教会史上看,基督徒对战争问题一般持有两种态度,一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态度,他们根据十诫中不准杀人的规定和基督“爱”的精神,主张通过非暴力的甚至自我牺牲的手段与社会非正义作斗争。另一类是持正义战争论,认为面对邪恶势力,基督徒有时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或反抗,受加尔文宗教清教徒影响的多数美国人就是持这种态度。这体现在他们发起的反英国的独立战争,也反映在为废奴而进行的南北战争中。他们坚信公义的上帝总是站在正义力量这边,与他们一起去战胜世界的恶势力。但上帝的旨意往往不为人所知,有时也会通过在人看来是非正义的事来实现他的旨意。在鸦片战争这个问题上,传教士态度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首先他们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非正义的。如卫三畏在1841年给他的父亲信中就說:“这次英军的整个远征在我看来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与鸦片贸易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它在这里的军事胜利将

① 转引自[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②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③ 同上,第177页。

④ 同上,第177页。

有助于其扩大这项罪恶的贸易”。^① 丁韪良对1859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天津大沽遭到中国军队抵抗充满了同情，并对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英国方面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他说：

“这些侵略者不仅首先发难，而且他们的整个行为都是错误的……那么多所谓文明的军队却始终执迷不悟。中国的政治家又会如何来反思英国人的道德水准呢？”^②

虽然鸦片战争是非正义的，但英国却取胜了，而且由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此传教士们的解释是：也许这正是不可预测的上帝旨意，通过这种方法，使福音能传入这个异教国家，以拯救中国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传教士们看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具有深远的宗教与历史意义。他们认为，英国凭借武力迫使中国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打开了大门。尽管他们继续谴责那些导致英国侵略大清帝国的‘罪恶原因’，但战争的结局却似乎让他们更为深信，一切皆为主的安排。对于裨治文来说，这些令人不安的战局，无疑证实了上帝救赎全人类计划的不可预知性”。^③

这种观念使传教士们对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均持肯定态度。美部会在《教士先驱报》上欣喜若狂地宣告“接连同中国签订的这三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任何一个，都是一个进步，打破了长久以来封闭着这个广袤的国家的隔离墙”。裨治文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对签署不平等条约后中国发生的变化持肯定态度，他说：“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政策不仅变得更加宽容，而且更为妥协。过去这个政府标志性的高高在上、视自己为宇宙主宰的姿态也改变了；他们现在变得愿意（其实是迫于无奈）以应有的平等方式待人。社会上涌现出改革的浪潮，势不可挡……过不了几年，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将遍布外国人的足迹，他们在这里就像在欧洲大陆一样自由和安全。”^④ 卫三畏对南京条约的签订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说：“根据1842年8月签署的《南京条约》，中国同意割让香港岛，承认和接受外国代表，同意五口通商和建立公平和正常的税收制度。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无知和骄傲一直顽固地阻碍着一种更高文明的传播，这一屏障由于该条约而被部分推倒，一个民间交往和官方接触的崭新时代开始了……上帝最终与这个民族开始打交道了，他会与他们一起进入最后的审判，并向他们展示仁慈”。^⑤ 伯驾声称，南京条约签订后，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传教士们看来，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提醒美国政府关注中美关系，并且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与中国政府商谈。由此他们不仅通过文字，而且以行动来直接影响美国政府。

三、通过游说和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直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有学者对当今美国福音派如何影响政府决策机制，总结了四类途径：1，精英游说：通过向政府精英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2，议题型结盟：与不同团体就不同议题结成统一战线进行游说；3，草根动员和造势，包括媒体攻势、基层教会动员、学术审视（召开有关问题的学术讨论）；4、国会游说，直接向国会成员的游说。^⑥ 这四条中1、4两条可以合并为一条：向美国政府高层和国会游说。

①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② [美]丁韪良：《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③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④ 同上，第206页。

⑤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⑥ 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4-241页。

2、3两条可归结为动员一切力量造势，向政府施压。

鸦片战争期间的传教士的情况与当代福音派的做法有类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利用一切力量造势及向政府高层游说这两个方面来影响公众和政府。不同之处是：由于传教士是那时唯一懂中文并了解中国的人，所以本身就直接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签订，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这点是当代福音派无法相比的。就“造势”而言，上面已提及，“游说”和“直接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传教士利用回国之际，向美国高层进行游说，引起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这点伯驾做得尤其出色。1840年6月，英国入侵广州，鸦片战争打响了，原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到澳门。伯驾此时得到返美的资助，在裨治文的强烈鼓励下，他返回美国。这次伯驾返美是负有使命的，那就是他要代表在华的几位美国传教士向美部会陈述其传教活动以及近期在华所发生的事件背景。不仅如此，他也要代表他们这几位在华作了若干年传教工作的美国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提请美国有实权的人物重视美华间的关系。由此，伯驾一到美国便前往华盛顿，向高层官员游说。他受到了范布伦总统和国务卿福塞斯的接见。与此同时，他被引荐给麻省极具影响力的参议员、下一届的国务卿韦伯斯特。^①伯驾向韦氏建言，美国政府应该承担起调停中英冲突的责任，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可以说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可信。美国商人很少涉入这项违法的鸦片贸易，而且有些美国商人因为坚决反对鸦片贸易，并努力利用自身影响以唤起西方国家的道德良知来抵制这一流毒，因而闻名于中国朝廷上下”。^②由此伯驾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促成与这个帝国签订一个公正的条约，这样有可能免除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从而实现造福全世界的目标。^③韦氏对他意见十分重视，在他成为下届国务卿处理中美关系时，便认真吸取了伯驾的意见。在美期间，伯驾还利用一切机会，在各个组织中向公众做了多场证道和讲演，由此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局势及美华关系的关注。

第二是积极支持帮助美国政府派使团与清政府接触。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范布伦的继任者泰勒总统下令海军司令加尼率东印度舰队开往中国，在严守中立的前提下，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向加尼提出要“防禁和惩罚美国船只或他国船只悬挂着美国国旗向中国走私鸦片”。1842年4月加尼到达澳门，受到裨治文的热情接待。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中把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商人走私鸦片的通告刊登在显眼位置，由此博得两广总督的好感。为与中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裨治文向加尼建言，向每位愿意到美国舰船上的清政府官员发出邀请。加尼立即照此办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水师提督接受了邀请。通过交往，中美双方都对对方产生好感。

第三，积极参与条约的签订，特别是为争取传教条款的订立竭尽全力。1842年7月，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英国从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这促使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做法，因为虽然中国官员口头对美国作了保证，但美商还是担心不能分享到英国所赢得的商业特权，由此强烈希望中美之间能签署一个条约。与此同时，在华美国传教士为美国在华的利益，以及在华的传教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传教环境，也希望有一个条约保护，由此也催促美国政府迅速派代表团前来与中国政府商谈。正是在美国传教士和在华美商的鼓动下，美国政府于1843年5月派政治家兼学者顾盛（Caleb Cushing）为特使来华，其使命就是要求中方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件。1844年2月，顾盛到达澳门，立即

① 参见[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② 乔治·史蒂文斯：《伯驾的生平、书信与日记》，187页，转引自[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③ 同上，第176页。

聘请伯驾和裨治文为参加谈判的翻译。6月18日,清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进行会谈。7月3日双方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美国又派了列卫廉公使与清政府谈判,由传教士丁韪良和卫三畏充任翻译,最终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美国传教士在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只是担任翻译,而且还充任顾问。具体而言:

1、条约签订过程中指导美国使团保持中美外交交往中对等关系。

清朝在与国外交往中往往自视天朝大国,因此与外国交往中,都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属国,在《望厦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伯驾和裨治文以他们对中国人的了解,不给清政府以天朝大国接见属国的方式来对待美国。当钦差大臣耆英前往广州途中给顾盛的两封信中故意将美国的国名写得比中国的退后一格,以示中国更高一等时,裨治文和伯驾立即提醒顾盛将此信退回,并告知这位钦差“陛下将会认识到信守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是明显更合适的做法,这对维护两个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友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两国的共同利益要求两国彼此给予对方一个独立强化应有的尊重”。正由于美国传教士的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较之《中英南京条约》更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官方往来时国与国的平等原则。^①

2、将反对鸦片贸易正式列入《望厦条约》第33条中,明文规定禁止贩卖鸦片。违反这个规定的美国人受中国司法机关判处。这条款使本条约与中英《南京条约》有了明显不同,对传教士而言,这是宗教道德的胜利。

3、确保在华的自由传教权。《望厦条约》第17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第18条废除了传统上禁止外国人学中国话的命令。中美《天津条约》第29款规定“对传教习教之人,地方官当一体保护,他人毋得骚扰”,^②这些条款的签订均是传教士的功劳。

传教士提出这些条款均是根据其在华亲身经历提出的。如《望厦条约》第17条规定在五个通商口岸可购买土地建教堂、医院、墓地,一则是为了确保传教士们在华有立足之地,二是为了他们传教的需要,特别是伯驾医药传道在广州取得的成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医药传教的方式。第18条,是保证他们能合法学中文的权利,因为传教的对象是中国人,能讲中文是传教士起码的要求,而此前清政府不允许华人教授外国人学中文。至于《天津条约》第29条款,是因为“鸦片战争事实上加剧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英国的大炮摧毁了太多百姓的家庭,这是谁都难以忘怀的灾难”。^③由此洋人受到中国人民的敌视,传教士的人生安全受到一定威胁,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这一条约中传教士强烈希望加入此条款。事实上这一条款的订立完全是卫三畏和丁韪良的“功劳”,其中卫三畏出力最大。这点在卫三畏的日记^④和丁韪良的著作^⑤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卫氏谈到1858年的条约中允许基督教传播最早是俄中双方谈判时由俄国使节提出的。中方表示鉴于传教士大都会说汉语,允许其在中国自由活动,但商人则没有此特权。卫三畏得知此消息后,第二天就搞到一份中俄条约的中文本将中俄条约中的规定“允许一定数量的传教士”^⑥这一限制性内容去掉,而引入了新教和天主教概念,结果未得中方准许,其理由是中方无法接受外国妇女在中国自由

① 如第三十条规定:嗣役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等之礼,用照会字样,领事等官与中国地方官公文往来,亦用照会字样。申报大宪,用申陈字样。若平民禀报官宪,仍用禀呈字样。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

②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348.htm>.

③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④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178页。

⑤ [美]丁韪良:《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沈弘等三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⑥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行动。卫三畏只能重新拟定。在有关传教条款修改过程中,美国公使列卫廉对它没有多少兴趣,甚至还提出将此条款取消,在签约的前夜,卫三畏一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条易于为中方所接受的宗教宽容条款。签约当天早上,在丁韪良的提议下,两人急速坐轿将此款及时递送交到中方手中。中方官员看了之后,稍作修改便接受了。这就是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中第29条款的内容。

丁韪良对整个传教条款达成经过有如下文字:“在全部三十份条款当中,有关宗教宽容的部分最难达成一致,起先大家认为通过就算了,但中方害怕我们以宗教之名将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输入内陆,因而对文件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也害怕这成为政治干涉的托词。他们是理智的,知道基督教这样与异教国家制度相对立的组织是不会和国家现状相调和的。……代表们今天承认皇帝曾试图阻止基督教在华传播,他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的原因是考虑到四大列强有意要传播基督教。”^①丁氏又分析了签约当天中方能这样迅速地接受传教条款的原因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存在,清政府“害怕一旦拒绝我们的要求,外国列强就会转而支持在华中省份尚有雄厚兵力的造反者”。^②上述情况充分说明美国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传教条款制定中是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虽然列卫廉本人对此条款不太热心,但由于“宗教自由”的信念融入每个美国人的血液中,所以任何一位美国外交官都不可能反对这一条款的制定。

传教士们的工作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肯定。顾盛和列卫廉都高度评价传教士们在签署条约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最重要并且最不可或缺的帮助。”^③“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④而且肯定了“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华的利益。”^⑤“将为美利坚合众国带来巨大的贡献。”^⑥因此有些传教士,如伯驾和卫三畏还被吸收为职业驻华外交官。他们先后都担任过正式或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在组织机构上较为明确地实施政教分离,所以当两人正式担任外交官前,都向美部会提出申请,取得同意并正式脱离传教士行列后,才完全进入政界。尽管进入政界,但他们基本的立场和对宗教的感情却丝毫未变。

总之,通过鸦片战争时期的传教士对美国在华决策上的作用,显示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强大影响力。在宗教界的影响下,确保宗教自由和传教自由往往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尺度,由此联想到,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部反对宗教迫害的重要法案——《国际宗教自由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美]丁韪良:《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沈弘等三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④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179页。

⑤ 同上,第178-179页。

⑥ [美]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Secularization Process

Wang Zongyu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its multiple aspects in a time of social changes,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he recovery of Dong-Yue Temple in Beijing. Secularization and De-secularization is a mode of description by sociologists for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relig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more than 5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 the government's attack on traditional religions is a particular form of the secularization movemen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secularization forces are also expression of religion in a modern society. In the last 30 years a new religious market has been forming in China. Government's control of religion has been weakening, but it still represents the values and modes of religious consumption of the ever-growing social classes.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dicates that secularization forces in China have not freed themselves of the forms of 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Key Words: the Dong-Yue Temple, secularization, religious consumption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S Politics: with Examples of US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

Duan Qi

Abstract: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s a basic principle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only means the separa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not the separation of religion from societ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is a discussion on the roles played by US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how they affected the signing of unequal treaties, thus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US politics.

Key Words: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the Opium War, US missionaries, Puritans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Sun Jiabao

Abstract: There is no government agency devo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in the US. US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religious affairs is performed by ordinary regulations, supplemented by government files. This paper show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aspects of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tries to present a brief summary 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religious affairs, administration, means, measures

Understanding of U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Xie Rongqian

Abstract: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has dominated political tendenc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North America since the colonial day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this tradition has been adapting itself to the ever-changing reality. The paper relies on the theme of history of the US to analyze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by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of the po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ountr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rea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 Christian tradition,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